

# 从“亚非”、“亚太”到“亚洲”

## —中国参与亚洲地区的多边合作—

青山 瑠妙

(早稻田大学教授)

◎ 原文刊载于「日」梅森直子·平川幸子·三牧聖子編著『アジア地域講座 総合シリーズ第3巻: 歴史の中のアジア地域統合』勁草書房, 2012年, 43~65页。

◎ 欧文东 译

### 1. 序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亚洲备受瞩目。目前,亚洲地区构建了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为核心的多层次、宽领域的网络合作机制。

长期以来,中国一向以大国间的权力政治为中心课题,所以除了自己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之外,对多边外交的关心度一直较低,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区域大国,具有二重身份的缘故(高原 2003:60)。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开始积极参加亚洲地区的多边合作。据国分良成(1995)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历了由旁观者(到20世纪80年代)、参加者(从20世纪80年代到天安门事件)到推动者(1992年开始)的角色转变。现在,多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多边主义也逐渐形成。

在 多边合作过程中萌生的多边主义是否能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这个问题对理解中国是否在今后的国际社会 中发挥建设性作用问题至关重要。王红英(wang2000:486)指出, 多边主义仅仅是中国政府基于现状而采取的战略手段, 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后, 目前的多边合作姿态完全有可能出现变化。

若要了解中国对多边合作的态度,需从现行的政策和历史的连续性两方面来把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过多次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浪潮。迄今为止,已建立了东盟、太平洋经济委员会(PBEC: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等各种区域组织。本章将从历史角度考察中国对这些亚洲区域组织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政策。

本章将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20世纪50年代到开始积极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所采取的亚洲政策,特别着重讨论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把握“亚洲”这一区域;中国如何认识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并改变其政策。

## 2.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由敌视走向默认

建国之初，中国非常重视恢复和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对多边经济体制持否定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世界体系也开始一分为二。有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在的世界银行，IBRD: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的国际机构是形成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国际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机构。而中国采取苏联阵营一边倒的基本立场，对西方的国际经济体制当然持批评态度。但中国也拒绝参加代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国际性机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也就是说，建国之初的中国拒绝参与到东西两阵营的经济体系之中。

1951年8月美国和菲律宾签订相互防卫条约，同年9月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签订安全保障条约（ANZUS: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日美签订安全保障条约。1954年9月还成立了东南亚条约机构（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为了打破美国的包围圈，中国从1954年开始改变之前对不结盟国家的态度，在中国周边地区培养亲中国和友好国家，确定了不让这些国家卷入冷战的政策目标（范2008:40）。

中国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但各种问题复杂交错，诸如与周边国家的边境线未定问题、华侨问题、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等等。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1955年11月21日，中国和缅甸在黄果园发生武力冲突，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与周边国家划定国界并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一贯主张视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边界条约为不平等条约，主张予以废除。但另一方面，尽管新兴国家继承了宗主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但在国际上，中国依然高举支持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直面政策矛盾的中国政府做出了姑息不平等条约并支援民族独立的决定（青山2011a）。

通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在解决与周边国家间的问题的过程中，国际共产主义大团结这一“革命”的原则被弱化了（陈2010）。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奏效，在万隆会议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缓解了与泰国的紧张关系，并在1964年前与周边六国签订了边界协议。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中国缓和了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其外交政策是以中国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团结以及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团结为基础的。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美苏两大阵营形成对立状态，中国的对外战略也转变为以“反美、反苏”为基本理念的革命外交，以支援以亚、非、拉美为主战场的共产主义运动。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两个中间的地带论》<sup>①</sup>，进一步强

---

<sup>①</sup>苏联和美国之间存在的两个中间地带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构成第一中间地带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构成

化支援处于第 1 中间地带的亚非国家的立场，它们被定位为反苏反美的直接同盟军。同时中国进一步明确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一体化的主张。此后，中国支援民族解放斗争的迹象愈加明显（笠原 1975:5,10-11）。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开始支持泰国、菲律宾等“亲美国家”的共产势力，特别是对泰国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势力，中国在培养人才和提供武器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援助。1965 年的这种援助遍及老挝、不丹、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扩大到 23 个国家和地区（沈&杨 2009: 476）。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东南亚诸国的共产党武装斗争愈演愈烈。当然，这与中国的政策变更不可能没有关系（原 2009:198-200）。

此外，革命外交也开始影响之前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中国与缅甸的关系。1962 年 4 月，奈温政权推行缅甸独自の社会主义计划，对外国资本和大企业等实行国有化，使缅甸的华侨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即使如此，中国依然重视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不仅对华侨的损失坐视不理，还停止接受华侨往中国银行的汇款业务，协助缅甸政府（范 2010:85）。但就在中国的革命外交色彩愈见浓厚之际，1964 年 4 月刘少奇访问了缅甸。虽然中国在对缅甸式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公开评论中没有批判缅甸的社会主义实验，但在内部却批判缅甸实际上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范 2010:85）。从 1964 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通过《人民日报》、国际广播电视台等对海内外宣布支持缅甸共产党。缅甸政府关闭两个中国领事馆，采取强烈反制措施。到 1967 年，中国发生打砸缅甸驻华大使馆的事件。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亚洲区域主义兴起，这恰好是中国与美苏严重对立的时期。中国对美苏的封锁政策有着强烈防范意识，当然反对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区域组织。

1966 年 6 月在韩国的积极推动下，亚太协会（ASPAC:Asian and Pacific Council）成立。对此反共同盟，中国政府把它与越南战争和朝鲜问题联系在一起，发表声明称：这是美国为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争而建立的“新侵略同盟”。

1966 年日本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并在其主导之下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ADB:Asian Development Bank）。本来，中国就对上台不久的佐藤荣作政权抱有很强的戒备心理（青山 2011b），因此，对日本推动的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予以猛烈批判，称其政治色彩浓厚，是为封锁中国和向东南亚扩张而成立的“亚洲反华集团”。

1967 年 8 月 8 日，越南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5 国成立东盟（ASEAN），结成反共主义联盟。中国把东盟（ASEAN）视为东南亚条约机构的“孪生组织”，认为它是美国为封锁中国而建立的新组织，予以反对。

1969 年美中开始接触，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处理方式及对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自 1971 年重返联合国之后，对联合国的重要机构采取了“选择性参加”的方式，与西方的经济机构开始有接触，但都没到加入。1973 年 9 月，中国外交部长姚鹏飞发电报要

---

的第二中间地带。

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驱逐国民党政府(Jacobson and Oksenberg 1990:63)。据说,后来世界银行邀请中国加盟,但中国拒绝了其邀请。同时,中国这个时期还在讨论加入曾被批判为“富人俱乐部”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问题。1971年11月16日,台湾退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周恩来指示对外贸易部和外交部就中国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问题进行研究。外贸部和外交部在1971年11月末的报告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加入GATT对中国更有利(李2008:336),但中国领导人最后的决定是“暂缓加入”。

与此同时,美中接触为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机会。中国于1974年5月、6月和7月分别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恢复了邦交。中国对东盟的敌视态度开始消除,但中国以反霸权主义为基调的外交基本方针严格规定了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据说,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特别提醒并强调指出:“越南加入东盟与苏联推动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战略及苏联的影响力扩大有关,会给东南亚带来不稳定因素。”(廖2010:41)。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最重视恢复和维护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主权,拒不参加属于东西两阵营的任何国际秩序。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之间就有分工,中国负责引导亚洲的国际共产主义潮流。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力争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潮流中发挥领导作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中国的“革命原则”暂时被弱化。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展标榜世界革命中心论的外交。可以说,这种革命史观形成了不同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团结合作”。

### 3. 走向全面参加:1978年至冷战结束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选择性参加”重要国际机构转向“全面参加”。同时,西方主要先进国家也认识到把中国纳入现有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敦促中国接受制度化的自由主义原则、规范和规则。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参加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两个特点。第一,与区域组织相比,中国更重视参加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20世纪80年代,中国不仅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成员,还开始积极参加裁军会议等多边安全保障机构。

第二,20世纪80年代,“南北的观点”促使中国参加国际秩序。中国充分运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通过加入国际机构筹集改革开放所必需的资金。1978年,中国向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 United Development Programme)署申请经济援助,从1979年到1990年共获得约400个项目的2亿1700万美元的资金援助(Feeney 1998:240-241)。此外,自1981年至1996年,中国从世界银行获得173个援助项目,贷款成交总金额255亿美元(Feeney 1998:245)。

20世纪80年代,此南北的观点还体现在中国参与区域组织的问题上。1978年中国派吕

子波出席在曼谷召开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年会。在年会上，吕子波说，“中国强烈希望促进与亚洲太平洋各国的友好关系并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明确表示有意参加今后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活动。后来，在198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的全体大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强南北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要求发达国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如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推进多边合作，以获得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中国参加多边组织与国内进行的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需要推动中国参加多边组织，此外，还伴随着中国对多边组织认识的转变。

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是中国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时期，中国与固守的“经济主权”诀别，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确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但中国完全不懂如何搞市场经济。因此，1980年在广东省和福建省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为了给在特区建言献策，特聘请日本的大来佐武郎、高坂正南和新加坡的李光耀等5名外国人担任经济顾问（《谷牧回忆录》2009:332）。向世界银行借外汇，必须加入世界银行。基于这一判断，中国政府决定加入世界银行。

1980年大平正芳首相明确提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虽然中国政府对此构想没有公开评论，但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持续紧张，出于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内部，实际上是对“环太平洋合作构想”予以积极评价的。大平构想提出之后，中国国内对此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完成研究报告。关于大平的环太平洋合作的构想，报告书指出：“从抵抗和防御苏联霸权主义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角度而言，大平构想具有积极的意义。”（高木2001:78-79）。

1982年中国提出全方位外交，实现了几个认识上的转变，给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能性和合法性。首先，认识由“战争不可避免论”演变成“战争可以避免论”。改革开放前，中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认识国际形势的基本原则，相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1977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认为：“距离美苏发动战争，特别是苏联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长则5年以上，短则2、3年。”但从1983年开始，特别进入到1984年，“战争可以避免论”逐渐成为主流。1986年年初，邓小平提出“两个调整”问题，中央军事委员会也统一认识，表示：世界已进入到和平时期（《宦乡文集（下）》1994:1315-1343）。中国放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认识国际形势的基本原则，使得超越意识形态的区域合作成为可能。

第二，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理论。1984年9月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发表联合声明。可以说，实行“一国两制”的摸索与尝试是关系到中国、香港和台湾同时加入后述国际组织的重大举措。

第三，这一时期还对“从属理论”进行了批判。1973年9月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在该会议的《经济宣言》之中首次使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一词。1983年8月22日到26日，北京召开“国际经济秩序理论问题研讨会”。在此次大会上，南北相互依存论是讨论的议题，与会者对以前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从属理论进行批判（高桥1990:31）。根据从属理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属于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发达国家榨取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致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停滞不前。毫无疑问，对从属理论的批判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1984年中国政府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在视察中，围绕“是否应该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是收还是发）”的问题展开讨论。2月14日，邓小平对视察进行总结，并确定尽快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方针。3月26日，古牧、胡启立主持召开了沿海城市座谈会，与沿海城市的领导人一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等40多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李2008:160）。会议持续12天，再次确认了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来发展经济的路线。5月4日正式决定并传达了对外开放上海、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

巧合的是，在1984年决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愈发关注亚太地区。加上印度尼西亚的积极推动，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问题成了议题<sup>②</sup>。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认为1984年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变化之年。受政府观点的影响，中国国内也开始广泛讨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问题。

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政策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宦乡强烈主张，中国应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刘1988:23）。在1985年3月曼谷召开的第41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上，中国表示“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员，中国将全力支持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因为美国高度重视亚洲太平洋、苏联意欲参加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ACC），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已渐成时代的大趋势。

其间，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申请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up>③</sup>。中国在1980年8月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议，1982年11月作为观察员参会。1982年11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外交部、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海关总署5部委联名提交了早日实现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提案，并于25日得到批准（李2008:333）。1983年8月，贸易部、外交部和海关总署组成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考察团访问了正在推动市场经济化改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发展中国家的巴基斯坦。考察团提出中国也应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建议，于1984年初，中国政府正式决定重返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随后，中国国内讨论如何处理的台湾和香港问题，台湾和香港已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在1986年中国递交正式申请之前，讨论有了基本的结论。1986年3月11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回归后、香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留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sup>④</sup>。同年3月，中国

---

<sup>②</sup>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是日本、东盟外长会议的扩大形式，1979年开始活动时，有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共同体（EC）议长国等区域外六国参加，每年召开一次。

<sup>③</sup>中国1986年的申请是恢复GATT缔结国地位的申请。

<sup>④</sup>1991年1月11日，澳门也参照香港方式成为GATT成员，1992年中国和台湾一并成为GATT观察员，台湾于2002年1月实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还成功加入亚洲开发银行（ADA），这实质上是中国和台湾第一次同时加入国际金融机构。虽然台湾加入的名义变更为“中国台北”（Taipei,China），但台湾仍可保留亚洲开发银行的创始成员身份（竹内 2008）。1986 年，中国第一次与台湾（中国台北）一同参加了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

关于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参加国际贸易组织，中国对台湾和香港问题的处理姿态比以前更加灵活，其背后的意图是为了获得改革开放所必需的资金和技术。随着中国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宦乡担任 1986 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CNCPEC）的初任委员长。他在 1988 年访日之际，谈到“中国正推动改革开放，需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假如在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的讨论能促进西方企业来华发展和投资，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是有利的。”（《朝日新闻》1988 年 5 月 24 日）。从此言论中也可以解读中国的意图。

1988 年中国出台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该政策与中国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相辅相成。1988 年 3 月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把对外开放的地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环渤海地区。至此，中国的沿海地区基本实现对外开放。此政策意在：加入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雁行式经济模式，把劳动集约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谷牧回忆录》2009:417-418）。其发展战略是：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素质高的优势，扩大沿海地区“两头（进口原材料和出口产品）在外”的发展模式，使沿海地区率先进入国际经济循环体系（高 1989:51-52）。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在西太平洋地区，各国的相互依存度显著提高，继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新型工业经济体的崛起，对东盟诸国的投资和东盟诸国间的贸易额急剧增加。《世界经济导报》东京分局局长赵文斗对沿海发展战略和雁行式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做了以下说明。当时的资本和“物”流是这样循环的：日本出资本、原材料、技术和设备，首先流向新型工业经济体，再流向东盟，在这些地区生产的产品再部分出口到日本。如果能融入到以日本为顶点的东亚国际分工体制网络之中，中国沿海区域的增长模式便可形成，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然后再把产品出口到日本（日中经济协会 1989:23-24）。当时负责经济的副总理田纪云说：“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是中国的竞争对手。”（日中经济协会 1992），他的发言也可以佐证赵文斗的言论。

#### 4.走向全面合作:冷战结束以后

天安门事件给中国的对外战略造成很大影响。天安门事件招致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孤立，但同时也变成了中国构建亚洲区域外交的契机。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决定于 1992 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阶段。

1992年2月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李鹏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分阶段促进内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边境贸易。改革开放已从开发沿海区域转移到开发“沿边”。

随之，不仅中央政府，边境的地方政府也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扮演主要角色。本节将基于上述中国国内的变化，结合中央政府的工作，同时考察地方政府的举措。

#### 4.1 走向经济与安全保障的全面合作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对本国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变得严峻起来，再次认识到周边邻国的重要性，展开了以改善周边邻国关系为主的周边外交。中国1990年5月、8月和10月分别与蒙古、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1991年9月和11月分别与文莱与越南实现邦交正常化。紧接着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在改善与周边邻国关系的进程中，1991年外交部长钱其琛参加东盟外长会议，中国与台湾、香港同时成功加入APEC。1992年中国开始与东盟对话<sup>⑤</sup>，进一步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鼓作气推进改革开放。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积极改善同周边邻国关系的系列举动也同中国对亚太经济形势的认识密切相关。199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对今后亚太经济形势进行了如下展望（《人民日报》1990年1月31日）：

（1）今后，亚太地区将比世界任何地区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

（2）在不远的将来，亚太地区不可能形成像欧盟那样的经济共同体，但经济合作将变得愈加密切。

（3）日本将与美国在亚太经济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4）今后，亚太区域贸易上的障碍将逐渐消除，金融市场将更加开放，区内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将进一步发展。

根据此预测，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没有调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推行至今的亚太经济合作的方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香港、台湾（中国·台北）同时加入APEC。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的提议下成立APEC。成立之初，成员国围绕是否接受中国加入意见不一。印度尼西亚表示为时尚早，而澳大利亚与日本则表示希望中国加盟。在此情况下，早在1990年1月，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就表明了中国愿意加盟的意愿，并寻求日本政府的协助。对此，日本采取积极促进中国加盟的立场。1990年7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遍访东南亚时呼吁应避免孤立中国。

这些努力见到了成效。1991年11月，第3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韩国首尔召开，正式决定中国、台湾和香港加入APEC。1991年8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表示，中国“愿统一解决”中国、台湾和香港加入APEC的问题，但有条件，例如：（1）香港、台湾不能以国家

---

<sup>⑤</sup> 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对话国。



身份加入；(2) 在加入的部长级别上，对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国大陆与台湾进行区分等等。中国坚持应该比台湾先行加入的原则，但 1991 年 11 月 23 日的“时差加盟方式”却表明，中国实质上是接受与台湾同时加盟。就这样，于 1991 年 11 月，中国、台湾和香港在首尔召开的第 3 次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上同时成功加入了 APEC。

就中国看来，PECC 充其量就是民间组织，而 APEC 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组织。当初，中国要求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 APEC，但最终的决定还是容忍与台湾同时加入。这倒说明加入 APEC 对中国有多重要。第一，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关系冷淡，加入 APEC 使中国找到了与西方诸国修复关系的途径。第二，加入 APEC 是为将来加入 GATT 做准备。世界经济出现 EU（欧洲经济共同体）和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成立的 APEC 以“开放的区域合作”为前提，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合作推进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新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三次 APEC 闭幕后，美国国务卿贝克（Baker, J. III）就中国与台湾加入 GATT 的问题，提议采用 APEC 方式。第三，中国也打算通过加入 APEC，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有利立场。从 1989 年 9 月 28 日到 10 月 3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东盟经济考察团访问了东盟。考察团在后来整理的报告中分析指出，东盟各国对中国加入 APEC 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台湾问题是改善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瓶颈。列举的理由是，东盟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超越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而且台湾的投资额年年递增（《东盟经济考察报告》1990:10-11）。事实上，台湾从冷战后期开始，就试图以这样的经济实惠作为杠杆，同东盟各国建立一定的政治关系（佐藤 2000:258）。中国这个时期确实对台湾和东盟的关系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由于台湾的“金钱外交”，东盟诸国中的菲律宾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危机感<sup>⑥</sup>。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的想法是，通过加入 APEC，不仅能够强化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而且还能够在 APEC 的平台上获得在台湾问题上的发言权。

在加入 APEC 的过程中，1990 年 12 月正在中国访问的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首相向李鹏总理提出东亚经济圈构想，不久向包括东盟各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提议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 :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后改称为 EAEC）（山影 2003:21）<sup>⑦</sup>。这个提案把美国排除在外，当然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也对与 APEC 理念针锋相对的 EAEC 想法表现出消极的态度，通产省的官员飞赴马来西亚，牵制与亚洲经济圈有关的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马哈蒂尔的 EAEG 构想，中国的反应极为慎重。1990 年 12 月 27 日李鹏总理表明“原则上支持”的态度，但同时指出“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不能套用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人民日报》1990 年 12 月 27 日）。

中国国内也有学者针对马哈蒂尔首相 EAEG 构想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提出异议。如国务院发

<sup>⑥</sup> 时任菲律宾副总统的萨尔瓦多·劳雷尔（Laurel·S）在休假时访问台湾，与李登辉会面。

<sup>⑦</sup> EAEG 构想是以东盟六国为中心，由日本、韩国、中国等 11 国家和地区组成，试图促进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EAEG 在 1992 年 1 月改称为东亚经济协议体（EAEC: 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展研究中心的季崇威，他就认为，美国的经济力量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而且推进亚太圈的经济合作对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有帮助（《人民日报》1991年11月14日）。

原本，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情势认识是支持“地域开放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着眼点是包括发达国家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内的亚太经济圈。中国持“南北”视点，克林顿（Clinton, B.）政府的人权外交使中国在最惠国问题上经常面临困难。因此，对中国来说，开放性、无差别和平等的重要性高过一切。1992年4月召开ESCAP第48次会议，刘华秋在会上提出的亚太区域合作五项原则就反映了中国的上述理念<sup>⑧</sup>。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特别指出，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中减少壁垒和障碍十分重要。APEC部长级会议强调了坚持开放和强化多边合作体制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经济区域化”，二是“政治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欢迎日美在亚太地区保持势力平衡。政府重要智囊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杜攻曾指出，“西西矛盾（发达国家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之一”，而且《人民日报》评论也称撰文论述“美国、日本和欧洲将成为世界的三大支柱。”（《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8日）。中国注意到“日本在民主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与西欧各国相似的地方，但日本的主张与西欧有不同的地方”，因此对日本寄予很高期望。在这样的潮流中，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讲话，说：“战后40年日本选择和平道路对世界和亚洲和平有利，欢迎日本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日报》1992年1月10日）。此外，中国对美国以APEC为立脚点欲在亚太地区建立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抱有戒心，同时又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欢迎美国在APEC内与日本保持势力均衡（Ravenhill 2001:112）。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打出的标语是“面向世界、立足亚太、搞好周边”。

中国着眼于日美对立并提防美国起主导作用，积极评价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所起的作用，对日本寄予期望。1993年1月成立的克林顿政府表明了重视亚太地区的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史敏指出，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的意图在于：与日本对抗，确保美国的领导权。他认为：“日美表面上称是合作伙伴，但从长期来看，亚洲地区主导权之争不可避免”，并通过展望指出：“必须承认，日本对东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后会出现日本在前面拉，中国在后面推的形式。”（『日本經濟新聞』，1993年1月17日）。非雁行式的双头列车论真实表达了中国当时的想法。

继经济领域的合作，中国在安全保障领域也表现出合作的姿态。1993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试图动员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立刻表示“乐意参加东盟的地区安保对话”。至于是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问题，中国表示赞成条约精神，但以中国不是位于东南亚为由给予否定的答复。不过，当1994年7月的东盟外长会议提出设立多边协议“东盟地区

---

<sup>⑧</sup>这五项原则是：（1）相互尊重，（2）平等互利，（3）相互开放，（4）共同繁荣，（5）达成共识。

论坛”（ARF:ASEAN Regional Forum）构想并就安保问题进行对话时，中国很快表示愿意参加。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外交方针的改变，中国传统外交方针是谋求在两国间解决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问题。1995 年之前的中国或许是抱着怀疑和防备的心理勉为其难地参加 ARF 会晤（Johnston and Evans 1999:258），但中国没有妨碍 ARF 的行为（Gill 2002:219）。

中国对亚洲多边安全保障框架转变态度的原因，很多学者提到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到重视意见统一的东盟风格（ASEAN Way）与中国外交政策有共通之处。另外，就是关于“与欧洲不同，亚洲不可能建立像欧洲那样的地区安全保障机制”（詹 1993:2）的预测，这也是促使中国加入 ARF 的主要原因。而且，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发生的对安全保障领域主权认识的转变，也是中国对多边安全保障合作转变态度的一个重大原因。1991 年 7 月中国首次参加南海协作会，围绕领土问题上的对立，开始高度评价“用和平方式解决纷争”的方式（龟山 2007）。于是，在 1992 年 2 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明确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的主张。

#### 4.2 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次区域合作

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对亚太经济合作及亚洲地区安全保障合作也很积极。但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大多数学者认为，亚太经济合作不过是松散的经济一体化，要当作长期性的目标去理解。同亚太经济合作形成对照，次区域合作最具现实性和发展快速，因而引人注目。各种形式的次区域合作成了讨论的对象，具有代表性的构想有“东北亚经济圈或环日本海经济圈”、“华人经济圈或大中国经济圈”、“南中国经济圈”（以广东、福建、台湾、香港为中心），“东亚经济圈”、“东盟经济圈”和“环黄海经济圈”（以渤海、朝鲜半岛西海岸、日本的九州和下关为中心）等。

随着 1992 年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陆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陆续对外开放。被称作“沿边开放战略”的构想由三个“边境开发区”构成，分别是由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组成的“东北开放区”、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主的“西部边境开发区”以及以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主的“西南边境开发区”（马 1992:20）。边境开放使中国的边境贸易迎来高峰期（服部 1994: 343-382）。

开发西北的关键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说，稳定和发展是两大经常性的政策课题。20 世纪 90 年代初之前，稳定常常被放在政策的优先位置。1992 年中国对新疆的对外开放开了绿灯。1992 年 6 月，国务院做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开放的指示，给予乌鲁木齐、伊宁、博乐、塔城四个城市优惠政策，开放奎屯和石河子市。至此，新疆设立了三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乌鲁木齐、奎屯、石河子）和三个边境经济合作区（伊宁、博乐、塔城），共开放六个地区。1992 年 9 月召开了第一次乌鲁木齐边境地区经济贸易洽谈会。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新疆谋求分裂独立的维吾尔族骚乱逐渐增多，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亚的东突厥斯坦运动更加活跃。面对这种情况，1995 年就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全面推行“安全第一”政策。1992 年起步的西北对外开放受挫。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成功的次区域合作是开发大湄公河流域(GMS: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的云南省发挥了核心作用,为成功开发做出了极大贡献。1992年,GMS构想是在亚洲开发银行的主导下启动,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积极参加,只把GMS看做通过引进国际资金而提升云南经济的一种手段(Ba 2003:633-635,Kuik 2005:103)。因此,中国派去中国人民银行的处长(低级别干部)参加GMS经济部长级会议。但是,当事者云南省却抓住GMS这样的大好时机,参加了1992年召开的首届GMS经济部长级会议并提出议案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视为最有希望的是东北开发区。1991年10月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署公布了图们江地区开发构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图们江地区开发构想浮出水面,当时正是中国、蒙古、朝鲜、韩国、俄国和日本6个相关国家关系开始趋向缓和的时期<sup>⑨</sup>。中国国内从1989年开始研究图们江地区开发构想,随后向相关国家提出。1992年4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参加图们江开发。之后,中央有关部委和当事者吉林省积极推进开发计划。

中国从1992年开始热衷于图们江地区开发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分别与朝鲜、俄国签署了有关图们江开发的若干一致性协议。不仅于此,中国还与蒙古就图们江地区合作展开了对话。

就在这时,在朝鲜半岛发生了一件从根本上动摇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事件。1993年3月朝鲜退出了防止核扩散条约(NPT: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并于1994年6月宣布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这次核危机后来经过美朝高官协商(1993年6月~),并于94年10月签署《美朝核框架协议》而得以平息。虽然一度受挫的图们江地区开发构想在这之后有再次恢复的强劲势头,但由于朝鲜核问题的影响而没能取得大的进展。

## 5. 结束语

中国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亚洲地区政策可分为3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对国际组织及20世纪60年代构建的亚洲区域组织实现了由敌视到默认的态度转变。从1978年开始到冷战结束时期,中国一改之前选择参加的态度,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从冷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不仅对经济,而且对安全保障领域的国际机构和区域机构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在有的领域,不仅中央政府,而且地方政府也成了区域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从敌视到默认,从参加到合作,从搭便车到推动者,中国对亚洲多边合作的认识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还不存在关于亚洲的区域政策,所认识的亚洲是“亚非”(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亚洲或“亚太”(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的亚洲。因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等,亚洲(周边)对中国而言,不再是“亚太”,而是真正的“亚洲”(青山2011c)。

---

<sup>⑨</sup>图们江区域开发刚启动时,中国、朝鲜、韩国和蒙古四国是正式参加成员,俄罗斯和日本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正如吴国光 (Wu, Guoguang) 所指,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多边主义并不是贯穿首尾的一条直线, 而是根据区域问题和政策问题而变化的 (Wu 2008: 267)。中国对经济领域的多边合作最为热心, 积极参加并试图推进其进程。1986 年提出在沿海地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加入亚太地区的雁行式经济模式, 因而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与国际经济合作接轨。从 1986 年申请回归 GATT、1991 年加入 APEC、2001 年加入 WTO 等一系列举动来看, 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接受国际规范, 并意味着中国基本上按国际规则行事。

与上述经济领域的多边主义相比, 中国启动安全保障领域的多边合作则很晚, 固守“不干涉内政”辞令的情况时常发生。今后该如何把安全保障领域的多边主义确定为中国的外交原则, 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章所论述的中国对多边合作的态度转变, 深受众多因素的影响。第一, 权力政治与中国和大国间的关系严格规定了中国对亚洲区域合作走向的认识和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反美反苏”的对外政策之下, 中国敌视东盟。在 20 世纪 70 年代“联美反苏”的对外政策之下, 中国开始对东盟持观望态度, 但强烈反对被视作“苏联阵营一分子”的越南加入东盟。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对大平构想持善意评价, 背后原因之一是对苏战略有利。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中国欢迎亚洲太平洋这一框架组织, 其背后有中国希望日美在亚太地区保持势力均衡的战略思考。

第二, 经济上的实惠也成为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强大后盾。自从引进优先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与国际组织、深化国际合作经常构成表里如一的关系。上述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和参加雁行式经济模式、引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参加亚太地区组织、后来启动的西部大开发与上海合作组织、提议缔结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FTA) 等, 可以说, 中国的这一系列举动清楚地表明了国内发展战略和多边主义之间的关系。

第三, 中国的多边协调姿态与中国对主权的想法也密切相关。多边主义多有要求出让国家主权的情况, 对主权的敏感度或许是把握中国多边主义去向的重要指标之一。

作为大国之间权力斗争的场所, 作为重要的经济合作场所和作为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据点, 亚洲地区对中国意义重大, 是中国重要的政策对象区域。正因为中国的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左右着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及相关各国今后要更加努力, 使多边主义成为中国的外交原则之一。

### 【参考文献】

青山瑠妙:「領土問題と中国の外交」,『中国年鑑 2011 特集:波立つ海洋・動き出す内陸』,中国研究所, PP. 38-44. 2011a.

青山瑠妙:「アジア冷戦の溶融としてのニクソン訪中と田中訪中」,『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八巻』,岩波書店, PP. 312-334. 2011b.

- 青山瑠妙：「中国『アジア一体化』の戦略と実像」、『現代中国 2011』, PP. 17-33. 2011c.
- 笠原正明：「中国と第三世界」,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研究年報』, PP. 1-24. 1975.
- 亀山伸正：「中国のアジア太平洋多国間協力ー中国外交専門誌による認識の変遷を中心にー」, <http://daigakuni.soka.ac.jp/assets/files/pdf/major/kiyou/15-syakai2.pdf> (最終アクセス 2011年 8月 30日). 2007.
- 高尚全：「沿海地区経済発展戦略を実施する鍵は改革の深化にある」, 『日中経済協会会報』第 2 期, PP. 51-56. 1989.
- 国分良成：「中国にとってのアジア太平洋協力ー傍観者から参加者, そして推進役へ」, 岡部達味編著『ポスト冷戦のアジア太平洋』,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PP. 101-131. 1995.
- 佐藤考一：「中国と ASEAN 諸国」, 高木誠一郎編『脱冷戦期の中国外交とアジア・太平洋』,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PP. 243-271. 2000.
- 高木誠一郎：「中国と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多国間協力」, 田中恭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 8 国際関係ーアジア太平洋の地域秩序』, 東京大学出版社, PP. 73-94. 2001.
- 高橋満：「第三世界認識の変容」, 小林弘二編『中国の世界認識と開発戦略ー視座の転換と開発の課題』,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PP. 17-36. 1990.
- 高原明生：「東アジアの多国間主義ー日本と中国の地域主義政策」, 『国際政治』133, PP. 58-75. 2003.
- 竹内孝之：「台湾の国際参加」, 若林正文編『台湾総合研究 II ー民主化後の政治』調査研究報告書,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http://ww.ide.go.jp/Japanese/Publish/Download/Report/pdf/2008-04-34-06.pdf> (最終アクセス 2011年 8月 30日). 2008.
- 日中経済協会：「中国経済と日本の協力の在り方」, 『日中経済協会会報』, PP. 23-24. 1989.
- 日中経済協会：「日中経済協会訪中代表団と田紀雲国務院副総理との会見記録」, 『1992 年度日中経済協会訪中代表団訪中報告書』, PP. 22-24. 1992.
- 服部健治：「内陸経済発展における辺境貿易の役割」, 丸山伸郎編『90 年代中国地域開発の視角』,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PP. 343-382. 1994.
- 原不二夫：『未完に終わった国際協力ーマラヤ共産党と兄弟党』, 風響社, 2009.
- 馬成三：『発展する中国の対外開放』,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1992.
- 山影進：『東アジア地域主義と日本外交』,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2003.
- Ba, A.D.(2003), "China and ASEAN Ren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up>st</sup> Century," Asian Survey ,43,4,pp.633-635.
- Feeny,W.R.(1998),"China and the Multilater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S.S.Kim ed.,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Pp.239-263.
- Gill ,B ,(2002)," China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Csbms)," In

- R.Ash Ed., *China's Integration In Asia*, Surrey : Curzon Press, Pp.216-245
- Jacobson,H.K.And M.Oksenberg (1990),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Johnston,A.I.And P.Evans(1999),”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I.J.Alastair And R.S.Ross Eds.,*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d Emerging Pow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Pp.235-272.
- Kuik,C.C.(2005),”Multilateralism In China's ASEAN Policy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spir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7,1,Pp.102-122.
- Ravenill ,J.(2001),*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UK;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 (2000),’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Asian Survey*,40,3,Pp.475-491.
- Wu,G.Ed.(2008),*China Turns To Multilateralism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 Secur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宦乡文集（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詹世亮：《亚太地区形势和中国睦邻友好政策》，《国际问题研究》4，pp. 1-3, 7. 1993。

陈兼：《将“革命”与“非殖民化”相连接——中国对外政策中“万隆话语”的兴起与全球冷战的主体变奏》，《冷战国际史研究》1，pp:1-46. 2010。

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 11 篇：中国与第三世界》，东方出版中心，2009。

《东盟经济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4，pp. 7-11, 18. 1990。

范宏伟：《冷战时期中缅关系研究（1995-1966）》，《南洋问题研究》2，pp. 35-43. 2008。

范宏伟《奈温军事政权的建立与中国的对缅政策》《厦大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pp. 82-88. 2010。

廖新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历程》，《党的文献》6，pp. 35-42. 2010。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刘江长：《太平洋国际关系的变迁与经济合作的新潮流》《现代国际关系》3, pp. 18-26. 1988。

## 【报纸】

《人民日报》

『朝日新聞』

『日本經濟新聞』